

大突围

中国经济

The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of China

邓聿文
著



面对不可回避的**改革与转型**，中国如何
应对挑战，化危为机，突破重围？

中央党校著名学者、评论家**邓聿文**

深度解析**民生大事与中国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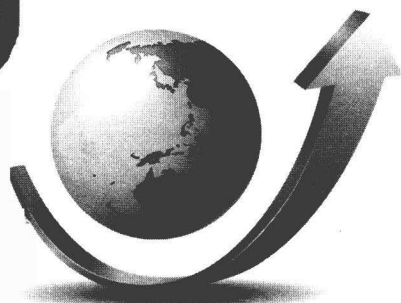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

The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of China 邓聿文 / 著

中国经济

大突围



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大突围 / 邓聿文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03-034704-6

I. ①中… II. ①邓… III. 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1911 号

责任编辑: 周 辉 张晓雪 / 责任校对: 张怡君

责任印制: 张 倩 /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科 学 出 版 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编务公司排版制作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 × 1000)

201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7

字数: 280 000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请我为他的新著作序，对于中国经济，我也想说说，就欣然同意了。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正面临着艰难的转型，或者如该书所说，“突围”。用“突围”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很形象、很生动。这个“围”能否在最近5~10年“突”出去，关乎我们是否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以及是否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当前来看，存在许多制约转型成功的因素。如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能力不高、企业创新的不足、要素改革的力度不大，等等，但最主要的，可能是学界谈论比较多的，在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难以打破。

坦率地说，30余年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我们的经济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个成就不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目前所面临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环境破坏严重以及社会矛盾加剧的局面。社会经济的不平衡现象到处存在，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再改革和转型的历史重任，它包括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经济增长动力，以及财富分配结构的改革与转型等，所谓寻求中国经济的大突围，我的看法就是在这些方面都要有质的突破。突破了，中国经济前面就是一片天；突破不了，我们就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更大的努力。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诸方面的突破，都与政府有关，也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要真正到位，从长期注重经济建设转向以提供包括制度公平在内的公共品为主，从强调管制转向强调服务。

中国政府正在向这方面努力。我们提出的“稳中求进”的发展思路，以及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发展中小企业等实业经济的扶持、对金融的试点改革，目的都是要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体制基础。虽然当下的经济困难增加了转型和突围的难度，但从大历史的视角看，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中国经济及其发展方式最终能够成功转型，这不仅是因为有

以上所说的中国政府的努力，还因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有压力的时候，改革和转型反而越能得到促进和发展。人在一帆风顺时，是很难产生危机感的；同理，当经济发展一帆风顺、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各方面都发展顺利时，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很难产生变革的动力。只有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企业无法从低成本中获取利益，才会有动力去进行技术和企业制度的创新；政府也才会在经济萧条的压力倒逼下，不得不去推动改革。所以，对改革而言，经济减速并非坏事。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能够从从容容地推出一些实质性的影响长远的改革举措。

该书从多方面阐述了作者对经济增长、宏观调控、楼市、股市、体制改革、公共财政、垄断与管制、民企与民营企业、企业责任以及全球大势与中国应对的观点与看法。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该书的分析与论述为人们认识和理解它们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参考。作者邓聿文是我国近年来活跃的青年学者，也是知名的时政评论家，写过很多观点新颖的文章，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让人们看到他对经济问题的一个较全面、系统的思考，其中的很多见解发人深思，颇让人受益。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恰逢转型阶段，中国的发展之路注定是不平坦的，但道路是曲折，前途是光明的。发展方式的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它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所以，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确保转型成功。对此，“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几条基本要求：一是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二是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三是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四是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五是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这五个坚持，实际上是我们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

该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转型和突围的艰难性。希望邓聿文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预祝这部书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方无畏

2012.5.8.

历史如白驹过隙，2012 年已倏然而至。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最近几年，从上到下似乎都处于一种焦灼状态。这是否是中国最终崛起前的社会阵痛，或者社会整体衰败的前兆，现在还无法判断，但当前正在不断深化的全球经济危机，客观而言是有助于中国加速转型与崛起的。当然，这要看中国能否抓住这一机会，变危为机，处理好自己内部的各种紧迫问题。从时间上说，外部条件给予中国的这个机遇时间不会太长，未来两三年最多下一政治周期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若无法妥善应对内外环境带来的各种挑战，则中国未来之命运确实堪忧。而要妥善应对挑战，重启以市场化、民主化、公民化为方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改革，就必不可少。

“中等收入陷阱”与“政府悖论”

中国的发展一般以 5 年为一个政治周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周期是以 5 年为一轮的。本届政府从 2007 年开始，于 2013 年两会后结束，从时间上看还有一年。应该说，这 4 年间，在前面近 30 年的发展基础上，中国在硬实力方面有了长足进展，但存在和制造的问题也很多。

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风险，可用当前人们关注和讨论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来描述和概括。“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社会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中国已经初步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某些特征。

中国未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在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政府悖论”，在近年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任何改革和发展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政府悖论”就是对政府主导的改革和发展付出的一种成本。所谓

“政府悖论”，根据一些学者的论述，指的是政府主导式改革需要一个有权威和有调控能力的强政府，但市场经济的建立又要求政府不断退出对经济进行干预的领域，由此导致的政府角色尴尬。“政府悖论”的出现，根源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而是由政府“人为”设计出来的，尽管这个“设计”要求贴近实际。这是一切再生型市场经济都会遇到的问题。不过，既然市场制度是“设计”出来的，那当然要求由一个权威的政府来“设计”。问题是，“设计”该制度的是人，而不是抽象的政府，这样，也就避免不了存在设计者自己的利益，而且这个利益必然不同于社会的利益，也不同于政府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代理者利益。代理者利益的存在及不断强化，使得政府不会轻易退出经济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有权威的政府既是再生型市场经济建立的必要条件，同时又成为市场经济后期发育的威胁和障碍。

因此，要解决“政府悖论”，最好是在政府的作用方面，界定清楚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并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政府适时退出。但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由于受到代理者利益的干扰，这个时机很难把握，政府很难在该退的时候退出。特别是在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就提出了适时重启系统、全面改革的任务。

重启全面改革的可能性及政改限度

改革的全面重启不仅取决于改革者的意愿和推力，它还包含一系列条件、时机、动力和需求。首先是社会对改革有需求，有需求才会形成动力，进而生成改革。其次，一项改革若要顺利推进，还要掌握好时机，时机不成熟，即使社会客观需要，亦可能不会成功，或推行起来代价巨大。

就当下来说，由上述分析可知，社会对改革的需求实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但社会却没有改革的动力，政府的改革也是困难重重。个中原因很多，不过，观察中国改革的实际状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改革本身的路径依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改革从实施来说，是一个由增量到存量、先经后政的推进过程，先在传统体制的外围培育新的市场主体和经济力量，待它成长壮大后，再转向改革传统体制本身。这种改革程序的好处，乃由易到难，可使前期改革的经验不断积累，成为激励后期改革的动力和深化的条件。但这样一来，也易形成对前期低成本改革成功经验的依赖，降低对后期成本的承受力。尤其在后期进入政府自身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受到“政府悖论”的作用以及代理人对自身既得利益的保护，改革后期攻坚会有很大的障

碍，从而陷入改革动力不足、自我锁定的困境。

要破除改革的这种自我锁定困境，需要引入外力。外力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府之外的力量，二是中国之外的力量。就前者来说，社会存在广泛的改革需求，问题是如何把这种需求激发起来，这就需要有催化因素。就后者来说，引入外力不是要让国外力量介入中国改革进程，这是需要坚决反对的，而是特指外部环境已对中国改革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它使得盛行了30年的外需型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而要使经济增长从依赖外需变为依靠内需，需要改变我们的分配体制，乃至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现在，两种外力实际都已具备，只需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这个合适的时机，恐怕在下一个政治周期，即“十八大”新领导人上台后的5年里。

全面改革包括经济、社会、政府和政治几个方面。其中，经济领域的改革重点有三：一是打破垄断，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二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三是加强金融体系建设，解决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社会领域的改革重点有四：一是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二是放权于社会，加快社会组织的发展；三是废除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破除阶层流动障碍；四是强化社会参与。政府的改革重点有二：一是限权和放权，减少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将政府垄断的权力下放给社会，让人们自我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有限政府；二是大力反腐，力争在反腐败上有制度突破。

上述改革要深入，都会触及政治改革，其实，也可以把它们看做广义上的政治改革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为政治改革创造条件。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实行社会的民主化，但在下一个政治周期里，只能是低限度的社会民主，重点是解决政治开放和社会参与不足问题。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社会全面的民主化需要很多前置条件，且民主本身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一些前置条件不具备时，贸然推进民主会适得其反。这些条件包括社会形成了一个以稳定的中产阶级为主的结构，社会保障网络初步建成，对规则和法治的普遍尊重，社会达成基本的共识等。或许有人说，为何不可一边推行政改一边创造条件，理论上当然可以这么做，但由于这些条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所以，最好还是它们大体具备才把社会民主作为改革的重点。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相应的发展任务，不应超越它所处的发展阶段。

改革也应作如是看。全面的政治改革只能是社会富裕后的结果。目前中国正处于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是把全面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革和体制转型作为重点，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民社会。政治改革当然在这一阶段也可推进，但只能是以稳妥的方式进行。

序

前言

第一章 需要有质量的 GDP

——关于经济增长

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判断 // 2

经济长期增长的体制难题 // 12

淡化 GDP，实现包容性增长 // 22

第二章 好政府是怎样炼成的

——关于宏观调控

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 36

宏观调控要利用好市场机制 // 44

从收费经济看发展困局 // 52

第三章 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

——关于楼市

需要对住房市场进行再改革 // 62

大建保障房之弊 // 64

限价商品房的反市场逻辑 // 68

经济适用房：退出还是回归 // 70

房地产不可能像日本一样崩盘 // 73
物业税能否降低房价取决于开征方式 // 76
依赖房地产投资的经济增长是危险的 // 77

第四章 股殇

——关于股市

郭树清的治市能否重塑一个健康的股市 // 82
不必恐惧养老金入市 // 84
股市的真实地位 // 85
股市不能毁于市场原教旨主义 // 87
中产阶级可能被股市套死 // 89
从股市暴跌中学到了什么 // 91
警惕权力资本进入股市 // 93
股市如何成为经济晴雨表 // 95
解决股市问题必须重建政府信用 // 97
股市需要寻求大智慧 // 100
走向资本大国需要解决的制度难题 // 102

第五章 保增长下的中国经济改革

——关于体制改革

产权改革为什么重要 // 106
启动铁路改革已刻不容缓 // 109
中国统计要彻底改革 // 111
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政治决断 // 113
半拉子改革导致中国油价比美国高 // 114
户籍改革需要梯度推进 // 117
流动性过剩其实是场经济危机 // 120
改革须从考验公众承受力转向让人民受益 // 123
稳增长下的经济改革 // 125
政府的治道变革 // 128

第六章 盛世当减税

——关于公共财政

预算民主也是政治民主 // 136

建设公共财政 // 142

为减负而减税 // 150

税改要动真刀子 // 156

第七章 积极推进国企改革

——关于垄断与管制

垄断已成央企专利 // 166

国资委怎样成为一个“好婆婆” // 171

努力推进国企改革 // 179

第八章 将颠倒的再颠倒过来

——关于民企与民营企业

关于“卢美美事件”的深层反思 // 186

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及其治理 // 191

私营经济为什么会有一个大“突破” // 196

关于民营企业 // 198

第九章 企业要成为社会责任的表率

——关于企业责任

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 206

企业家的慈善与社会责任 // 207

环保责任是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 // 211

诚信是企业竞争力最重要的软件 // 213

竞争才能使资本讲道德 // 214

“中国信用”比“中国制造”更重要 // 216

企业道德的反思 // 218

第十章 思想之宴

——关于一些经济观点的争议

金融危机能否终结新自由主义 // 222

民富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 // 224

中国到了加速为环境还债的时候 // 226

外来人口问题应该交由市场去决定 // 228

养老金缺口实则是人口危机 // 230

金融开放才能降低银行暴利 // 232

第十一章 博弈国际规则

——关于全球大势与中国应对

全球“老二”的位置不好坐 // 236

不必把欧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否看得过重 // 240

须有与美国打贸易战的勇气 // 242

航空“碳税”与未来发展领导权 // 248

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权 // 250

在新的国际金融经济体系重建中应确保话语权 // 252

利用外储建立中国版的“国际访问者计划” // 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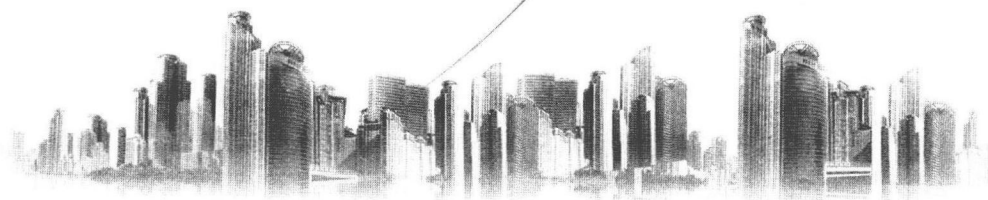
第一章

需要有质量的 GDP

——关于经济增长



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判断
经济长期增长的体制难题
淡化 GDP，实现包容性增长



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判断

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吗

2012年2月,在西方情人节时开启美国之行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于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中美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在谈到中国经济时,他说中国经济将按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而绝不会出现所谓“硬着陆”。这是中国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最新表态。

自2011年6月以来,外国投行突然集体看空中国经济,下调经济增幅,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两三年内存在硬着陆的风险。他们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工业生产放慢可能较预期严重,中小企业的财务紧张局面将蔓延至经济的其他部分;受国内劳动力紧张、限电,以及欧美订单减少的影响,当年出口增速可能为零;仍面临更严重、更长期的通胀压力。国内也有观点认为,受信贷紧缩过猛影响,中国经济存在滞胀危险。

笔者不用“阴谋论”的观点看待外国投行对中国经济的集体看空。基于自身利益、预测能力及在资本市场的话语权优势,外国投行看空或者看多中国市场都很正常。不过,根据以往其对中国股市和经济的多空预测,对错基本对半开,也就是说,外国投行的预测并不总是对的。所以,对外国投行的唱空或唱多言论,不妨故妄听之,没必要一听唱空就把自己弄得神经兮兮,一听唱多就喜形于色。

但我们对问题本身,即是否存在硬着陆风险,还是要高度重视。要搞清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让我们先来看看有关硬着陆和软着陆的含义。一般来说,国民经济的运行是一个动态过程,各年度经济增长率的运动轨迹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围绕潜在增长能力上下波动,当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期之后,超出了其潜在增长能力,打破了正常的均衡,经济增长率将回落。这就是一个“着陆”的过程。只不过,硬着陆是用一种“大起大落”的方式,强行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其表现形式是,对前期的经济过热,采用“急刹车”的办法进行“全面紧缩”,导致经济在短时间内

从过热迅速转向过冷，增长率大幅度降落，甚至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也出现显著回落，失业现象严重。软着陆则恰恰相反，紧缩政策的实施，并未导致经济的快速大幅下滑，而是平稳下降到一个合适的比例，同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通货紧缩和失业。由于经济是一个平稳下滑的过程，所以软着陆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点。

由此来看，在宏观经济过热时，我们需要经济运行的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以避免宏观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破坏经济中的各种均衡关系。当然，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取决于政府调控的艺术和水平，这里的平衡关系很难把握，现实中各国多半是以硬着陆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速的回归和通胀的降低。

以此判断，中国经济以何种方式安全着陆，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从经济增速、物价水平、就业状况三个方面来分析。

先看短期。已经过去的 2011 年的信贷紧缩程度，尤其是前三季度，无疑堪比金融危机前。正因为此，加上有史以来的电力短缺及廉价劳动力减少，外国投行才作出了中国经济存在硬着陆风险的预测。通胀的加剧似乎印证了此预测，全年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达到 5.4%，超过年初预定的 4% 的物价控制目标，特别是 6~8 月三个月，物价涨幅超过 6%。但这是否预示着经济增速会大幅下滑，通胀变得不可控？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

分季度来看，虽然 2011 年的经济增速逐季走低，一季度同比增长 9.7%，二季度增长 9.5%，三季度增长 9.1%，四季度增长 8.9%，全年经济增速为 9.2%，但即使取增速最低的四季度的经济数值与一季度比，其回落的幅度也没突破 1%。因此，中国经济尽管总体呈下滑态势，但是一个平稳下滑的过程，这样的降幅对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而言，根本称不上硬着陆。

另外，尽管国内外很多学者不看好 2012 年的中国经济，极端的预测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在 2012 年增速可能会降到 8% 以下，在 7.5%~8% 徘徊，然而，即使中国经济增长真的“如其所愿”，也并不表明已经在硬着陆或者将要硬着陆。首先，从前述关于硬着陆的定义看，尽管 7.5% 的增速预示其回落幅度比上年有所扩大，但还处于硬着陆定义的边缘，仍在可控范围内。其次，即使经济显示出硬着陆的迹象，中国政府也会有很多的政策选择来刺激经济增长，不应小看了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目前的经济增速，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调控的结果，虽然下降的幅度有些超出其预期，但并

非不可容忍，就此而言，如果经济进一步下滑，中国政府就会进一步放松调控力度。从实际来看，一季度可能是中国经济最艰难的时候，即便如此，从表示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物流与采购经理人指数看，进入 2012 年来，这一指数正在逐步好转，重回 50 以内。再次，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是就业，人们对硬着陆的担忧，也主要是针对就业而言的。经济增长下滑，表明很多工厂将处于停业或倒闭状况，这些工厂的工人将会失业。但从年初传出的消息看，大面积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并未出现；恰恰相反，各地不断传来的是“民工荒”，是最低工资水平的不断上调。若经济增速下滑不影响就业，再低的经济增长也是政府乐意看到的，因为政府正好借此时机，将在高速增长时期无法办到的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升级的事情做好。最后，从通胀看，经济大幅下降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物价走低。高通胀影响的人群不仅是低收入者，还包括绝大部分中产阶层，所以，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抗通胀从来都比保增长更是政府优先处理的课题。经济增幅下降，表明引发通胀的一些因素将大大减弱。实际物价走势也证实了这点。从 2011 年 7 月物价创下年内 6.5% 的高点后，涨幅连续回落，12 月份，同比只上涨 4.1%。2012 年 1 月，虽受新年和春节影响，物价有所回升，但环比也只是微幅上涨，进入二三月份，物价可能再次转入下跌通道，通胀压力相比上年，将大大减轻。

总之，短期而言，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便硬着陆，中国政府也有很多备选手段，并不可怕。

再看长期。根据一些经济学家预计，中国未来 30 年还能保持 7~8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这个预测当然是偏向乐观的，它建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还会提供大量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需求(特别是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公共投资增长)、消费增长、社保体系的发展和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所导致的消费品市场的增长等基础上。不过，以中国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未来 30 年达到 7% 以上的增速，客观上似没必要。

如果说 30 年时间太长，充满着很多未知因素，那么在“十二五”时期内，是否存在外国投行预测的硬着陆问题？笔者的看法是，虽然未来几年存在房价高企、银行呆坏账增多、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但亦不大可能出现经济暴跌的情况。首先，连续 7 年的粮食增产，使中国目前拥有充足的粮食供应，这为制约通货膨胀持续走高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其次，3 年 3600 万套保障房的建设，也足以使得投资增速仍然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再次，随着收入分配政策的出台，人们收入水平